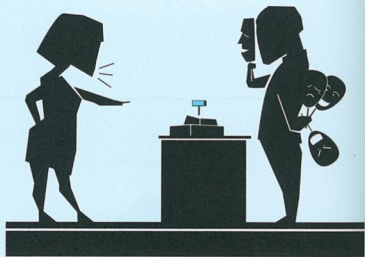


# 賤人為何矯情？

一個社會學的解讀



大家都看得見的公開場合是強勢者的天下，他們設定了一套「宮廟堂儀」，要求弱勢者按照官方的劇本演出，周而復始地表演出恭敬從命的姿態。

自從 2012 年以來，一部以中國宮廷權力鬥爭為題材的《後宮甄嬛傳》在台灣上映，其中一句台詞「賤人就是矯情」成為了流行的用語。有人和鄰居起糾紛，用這句話來罵人，結果被法院判處罰金，足部按摩業者也用「健人就是腳勤」

hypocritical

來做廣告宣傳。立法委員更擔心這句話會「教壞囡仔大小」，要求電視主動消音。這句台詞似乎講出了很多人的心聲，許多令我們感到厭惡的人物，往往虛假做作，言談中沒有一點真誠。

從社會學角度來看，「矯情」似乎是我們日常生活常有的表現。當我們周遭有人遇到事業不順、感情糾紛等不如意之事，身為朋友當然要表達關心，提供協助。但是不可否認，有時候我們或因交情不夠，或因當時的身心狀況，也可能不是真的那麼關心對方的處境。即便如此，我們還是有義務要展現出在意的樣子。理所當然，當自己成為苦主時，我們也知道很多噓寒問暖或許也只是場面客套話，不需要太認真對待。真正通情達理的人不會交淺言深，對於點頭之交的問候語，我們通常不會掏心挖肺，傾訴內心真正的想法。這就像是臉書的「讚」，大部分情況是意味著「我讀到這篇近況了」，或是維持友誼的公開宣示，並不代表認同或喜歡版主所寫的內容。

簡單講，「矯情」就是隱藏我們內心真正的想法，配合公眾與社會的要求，呈現出別人所期待的樣子。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無處不矯情，服務業要有顧客至上的態度，課堂教師需要展現出誨人不倦的精神，學生被要求全神貫注、認真聽講。在公車或捷運上，連乘客都需要主動讓座給老人與孕婦。這些表演的義務強而有力地控制了我們，無論我們當時的實際心境為何，幾乎都不可能不遵守。

## ■ 日常的矯情

社會學家高夫曼（Erving Goffman）在1959年出版了經典著作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》（*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*），解開了這個為何必得「矯情」的謎團。高夫

曼認為，所謂的社會不外乎一系列我們要配合演出的角色，一旦進入某一種角色情境中，就需要順從其角色要求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需要進行印象管理，將被肯定的那個面貌表演出來（例如銷售人員以客為尊的殷勤），而將令人不悅的部分隱藏起來（例如面對蠻橫奧客的無奈）。基於這樣的要求，我們需要進行觀眾隔離，在空間上劃分出別人看得到的前台與看不到的後台。試想一想，用餐客人一旦看到內場廚房實際狀況，還有多少人願意大快朵頤？

高夫曼的看法常被認為過於憤世嫉俗、犬儒主義，彷彿我們身處虛情假意的世界，沒有任何真心誠意。這是錯誤而膚淺的解讀。高夫曼的核心目的並不是指責社會的偽善，或是個人的奸巧，而是指認出社會生活中的必要道德成分。一個平庸而缺乏想像力的看法是，道德就意味著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規則，沒有任何背德行為。這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烏托邦。社會學的思考指出，道德的力量無法確保違背規範的行為不會產生，而是確保這些行為一旦出現，公眾就能指認出來，並且加以譴責，釘上負面的標籤。一個社會之所以有道德，並不在於大家都循規蹈矩，完全接納了某些共同的規範，而是在於我們都需要「矯情」，抑制自己的情欲與好惡，配合情境的要求，扮演好應有的角色。可以這樣說，高夫曼的討論深化了西諺「偽善是邪惡對於美德的致敬」的意涵。我們當然厭惡偽君子，因為他們似乎都帶有某些不良的意圖，試圖騙取我們的信任，但是更可怕的其實是毫不掩飾的真小人，他們的行為才真正挑戰了我們共同信奉的規則。

## 「賤人」的矯情

「矯情」是必要之惡，為了維繫共同生活，我們不得不將真實的自我隱藏起來。如果我們肯定了這一點，那麼下

一個要解答的問題就是，為何賤人比「非賤人」更需要「矯情」？

我們先還原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，所謂的「賤人」，原意是社會地位較低下的群體，而不是品德有缺憾的人。對於中國宮廷貴族而言，所有的老百姓都是「賤人」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但是，這也是統治階級的偏見，讓我們不知不覺將地位低下與品德缺憾畫上等號。這是統治者的顧影自憐與自我沾光，意味著擁有權力即代表道德與倫理上的優越性。因此，今日我們口語中「賤人」，總是帶有道德非難的指控。

一個不難發現的情況即是，越是處於弱勢的社會地位，越是需要「矯情」。在日常經驗中，我們都知道，老闆可以對下屬頤指氣使，但是後者卻只能忍氣吞聲，逆來順受。台灣人常描述的工作經驗即是「吃人頭路、吃個飽飽、裝成鈍鈍」。弱勢者特別需要隱藏自己的真正情感，強勢者卻往往免於這樣的要求，那麼，這對於我們思考社會壓迫又有何種啟發？

政治人類學家史考特（James Scott）進一步解答了高夫曼遺留下的問題。在1990年出版的《支配與抵抗的藝術》（*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*）一書中，他提出了這樣的觀察：「任何支配體制都會例行侮辱、傷害人類尊嚴——占有勞動成果、公開羞辱、鞭打、強暴、巴掌、猜疑、鄙視、儀式性汗巖與其他。」因此，在承平時期的被支配者學會如何在這種殘酷的體制中生存，將不滿隱藏起來，表現出一副恭順的樣子。換言之，被支配者往往需要強大的情緒管理能力，不滿只能默默地往肚內吞。

高夫曼區分了公開的「前台」與看不見的「後台」，史考特進而強調任何支配也具有兩面性：大家都看得見的公開場合是強勢者的天下，他們設定了一套「宮廟堂儀」，要求弱勢者按照官方的劇本演出，周而復始地表演出恭敬從命的姿態，這即是所謂的「公共腳本」，但是在一旦處於支配者

所看不見的角色，被支配者卻採取「隱藏腳本」的策略，例如各種「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」的因應之道，試圖避免更多損失，或是為自己贏得更自由的空間。越是處於極端不平等的壓迫，例如奴隸制，公共腳本與隱藏腳本的落差越大，也意味著弱勢者更需要「矯情」。

那麼，統治者會不會看穿「矯情」的假象？某些愚笨的統治者相信從屬者的公開表演，以為這就是現存的社會秩序，也是應有的社會關係。但是他們忽略了從屬者無所不在的日常抵抗，不斷地在私底下挑戰支配體制的極限。也有些比較精明的統治者看到從屬者的表裡不一，有些時候似乎只是在做表面工夫，而不是真情流露。在這情況，統治者通常會採取本質論的解釋，往往認為是地位低下者本身缺乏教養，或是品德不良，而不是歸因於支配關係所造成的人性扭曲。在幾乎全世界的傳統支配情境下，「奸巧」（cunning）是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刻板印象，也因此出現了中國宮廷貴族所說的「賤人就是矯情」。

## 兩種矯情的啟示

從社會學角度來看，「矯情」有兩種可能。一種是為了社會生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。為了維持共同的道德規則，我們不得不隱藏赤裸的自我，呈現他人所期待的樣子。另一種「矯情」則是弱勢者被迫採取維生手段，如果他們不按照權力者規定的方式行事，可能會喪失生計，甚至有生命危險。

因此，社會學的分析也引導了幾項結論。首先，請不要再講「賤人就是矯情」。對於現代多元而開放的台灣而言，這種中國封建的道德觀只會帶來負面的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說人就是說自己，將這種台詞當作流行俏皮話使用的人，其實是在「自我作踐」，因為我相信，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敢講

出真心話，而懷抱「心事誰能知」的無奈與苦悶。

其次，我們要盡可能消除權力所帶來的「矯情」。現代社會講求的是功能分化、平等主義，與對個人的尊重，從古代的師徒制到現代的師生關係即是明顯的例子。不受限節制而缺乏民主課責性的權力，往往導致極端的不平等，迫使弱勢者需要不時「矯情」，如此一來就喪失了人性的尊嚴。

最後，無論怎麼樣民主化的社會，權力作為一種協調公共行動的元素，還是不可能完全消失。在制度上，我們可以盡可能改善，避免權力遭濫用。但是對於上位者而言，更重要是反思之後的修養，如果不懂得更審慎而自覺地使用權力，那麼還是有可能製造了下位者的困擾，他們被迫「揣摩上意」，導致了「矯情」的後果。